

关于蒙古语史上“i 转折”的有关问题*

栗林均 著

朝克 译 白荫泰 校

兰司铁在一九〇三年公开发表的《蒙古旧书面语和乌尔格方言的比较语音学》^①一文，曾为蒙古语史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它作为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而享有盛名。这篇论文不仅对当时的乌尔格^②蒙古语口语在语音学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而且还把蒙古语口语同蒙古旧书面语的正字法进行了比较。

一直被蒙古民族作为书面语而使用的蒙古旧书面语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2~13世纪，因此，对兰司铁先生来说，蒙古旧书面语同乌尔格方言的关系就象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一样，在比较语言学里这种关系则被认为是母语和子语的关系。《比较语音学》一书揭示了被推断为蒙古书面语基础的12~13世纪的蒙古口语向乌尔格方言的语音学转化的详细过程。

兰司铁在《比较语音学》一书中强调指出的“i 的转折”现象也是乌尔格方言当中一个重要的语音变化之一。也就是说在蒙古旧书面语中，第一个音节里具有元音 i 的词，若在乌尔格方言中同一个词由于受后续音节的其它元音的渗透，使第一音节的元音 i 转变为另一种元音的现象。兰司铁把这种现象叫做 Brechung (Brechung 一词有‘转折’或‘割裂’等意思)，并且他对 i 的转折现象规定了如下格式^③。

| | | | |
|---------|---|-----------------------|------------|
| a 前的 i | > | i̇a, a; | 在词头是 ja、ja |
| mingan | > | m ^{i̇} ang<ɢ | “千” |
| miqan | > | maxxɐ | “肉” |
| imagan | > | jamā | “山羊” |
| e 前的 i | > | i̇e, e; | 在词头是 *jē>i |
| bider | > | B ^{i̇} èDDər | “斑纹” |
| nigen | > | neg | “一” |
| u 前的 i | > | i̇u, u | |
| cilagun | > | tš ^{i̇} ulūɢ | “石头” |
| cisun | > | ts ^{i̇} us | “血” |
| ü 前的 i | > | i̇ü, w; | 在词头是 jü。 |
| sidün | > | swD | “牙齿” |
| jisün | > | jüs | “九” |
| o 前的 i | > | o | |
| cino | > | tš ^{i̇} onɐ | “狼” |
| irogor | > | joröl | “底” |

* 本文是笔者对一九八二年六月五、六日在上智大学召开的日本语学会第八十四次大会上发表和进行讨论的原稿作了补充和修改。

| | | | |
|--------|---|-------|------|
| ö 前的 i | > | ö | |
| irögel | > | jöröl | “祝词” |

附带说明一下,“Brechung”一词是从印欧比较语言学里借来的术语,根据叶·契瓦鲁斯(E. Sievers)①的说法,特别是在日耳曼祖语里 Brechung 一词被解释为:单一的元音受邻接辅音的影响而出现二重元音的现象。精通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兰司铁注意到了乌尔格方言中的第一音节的过渡音,并且对上述的现象用“转折”这一术语加以表达。

反过来说,我们认为:由于兰司铁把上述现象看成是“转折”的缘故,所以在某些方面对过渡元音做了不必要的强调。由此看来在蒙古语学的惯例当中,“转折”一词已经失掉了从“转折”到“二重元音化”的含义,只是从“逆行同化”这个意义上加以使用。波普对“i的转折”所下的定义是“第一音节的元音 i 被第二音节的元音所同化的现象”⑤。这个定义在今天一般来说已经为人们所接受。所以本文也准此。

1. 兰司铁对乌尔格方言中“转折”这一语音现象所做的图式,虽然在细节上受到了某些修改,但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样被继承了下来。例如:符拉基米尔佐夫写的《喀尔喀方言和蒙古旧书面语比较语法》⑥一书在蒙古旧书面语和蒙古方言口语的比较研究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在书中就利用 15 页的篇幅对“i 的转折”新增加了许多丰富的例词。同时也作了例外说明,但仍然基本上沿用兰司铁的图式⑦。

“i 的转折”现象在蒙古语史上被视为很重要的语音变化之一。波普把十六世纪作为蒙古语史时代划分的大致界限。十六世纪以前的叫“中古蒙古语”(Middili Mongolian);十六世纪以后的叫“现代蒙古语”(Modern Mongolian)。但是,他认为:“i 的转折”是同蒙古语的第二次长元音的形成和词首 h 辅音的脱落等语音现象是并列的,它是具有“现代蒙古语”(Modern Mongolian)特征的语音变化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现代蒙古语诸方言里产生的“i 的转折”图式除了“e 前的 i”之外,仍然是以兰司铁的图式为基础,并且对它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⑨。

但是,在蒙古音韵史上象这样被认为是重要的语音变化之一的“i 的转折”现象,还存在着许多例外的“不规则”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按照波普的观点⑩,尽管在现代蒙古语里,a 前的 i 转变为 a; u 前的 i 转变为 u,但实际上 a 前的 i 并不是经常转变为 a 音。

道尔弗曾经引证波普的:

“在现代蒙古语当中存在着许多例外 (unmerous exceptions), i 在同等语音条件下,有的方言里可以转变为 a 但在有的方言中则不产生任何的语音变化,仍保留其原来的 i 音⑪。”这一论点。并且他断定:

“蒙古语的发展往往是很特殊的,因而难以说明⑫。”

然而,蒙古语史中的“i 的转折”现象确实是一种与传统的比较法截然不同的语音现象吗?对此,我认为似乎还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以探讨诸方言之间相互对应的不规则性为出发点,试图弄清关于在现代蒙古语中“i 的转折”图式的合理应用问题,和从兰司铁以来一直沿用的关于喀尔喀方言中“i 的转折”图式本身所潜在的某些问题。

2. 我们首先探讨伴随“i 的转折”而产生的诸方言间的“不规则的对应”现象。在这里我们例举了蒙古旧书面语中出现在元音 a 前的 i 位于绝对词首的情况,同时展示出对现代蒙古语诸方言里同“i 的转折”现象相对应的那些元音的表现形式所做的调查结果⑬。

关于位于绝对词首的 (a 前) 元音 i 的发展情况,波普⑭和兰司铁⑮所做的“转折”图

式是；

“a 前元音 i > 在词首是 ja”

这一图式一般来说已为人们所接受。这不仅限于喀尔喀方言，而且也作为鄂尔多斯、卡里梅克、布里亚特等现代蒙古语诸方言的语音变化图式而被承认^⑥。与常常作为例子而引用的蒙古旧书面语 *imayan*《山羊》一词相对应，在诸方言里第一音节的元音 i 所产生的转变恰好与上述图式相吻合。例如^⑦：

mo. *imayan* = urd. *jamā*, kalm. *jamān*, bur. *jamāŋ*, kh. *jamā*.

但是，随着对各个方言中的元音 i 所表现的具体情况增加新的调查事例，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上述的例子绝不能确切地代表位于词首的元音 (a 前) i 的发展情况。同波普和兰司铁所说的正相反，这种情况在鄂尔多斯、卡里梅克、布里亚特诸方言里词首元音 i 有规则地被保存了下来，并与蒙古旧书面语的 i 相对应。在这些方言里，只有在与蒙古旧书面语 *imayan*《山羊》一词（及其它的派生词）相对应时，第一音节才出现 ja 音。总之，已往的图式是把“例外”摆在主要的位置上，而把“规则性”说成是例外，结果产生了主客颠倒的观点。

再说，在布里亚特方言里，同蒙古旧书面语 *iryai*《樱桃酒》相对应的 *jargai*~*irgai*《雄椴木》等两种形式可能是由于借用而产生的现象。特别是在卡里梅克方言里若干个单词的第一个音节中出现了 ja，或者是 ja~i 交替。这种情况能够证实元音 i 是集中在辅音 r 前面的。

只有在喀尔喀方言里，第一个音节中的 ja 是按规则进行变化的。

表 1

现代蒙古语诸方言里词首元音 i (a 前) 的对应情况^⑧；

| | mo. | urd. | bur. | kalm. | kh. |
|-----------------|-----|------|------|--------|-----|
| ① <i>imayan</i> | i | ja | ja | ja | ja |
| ② <i>iryai</i> | i | i | ja~i | ja | ja |
| ③ r 的前面 | i | i | i | ja(~i) | ja |
| ④ 其他 | i | i | i | i | ja |

例如：

① 已经例出

② mo. *iryai*《樱桃酒》，urd. *irg<a*《一种耐寒植物》，bur. *jargai*~*irgai*《雄椴木》，kalm. *jaryā*《银莲花》，kh. *jargai*《雄椴木》。

③ mo. *ira-*《翻开》，urd. *ira-*，bur. *ira-*，kalm. *jar-*~*ir-*，kh. *jar-*。
mo. *irjayi-*《龇牙咧嘴》，urd. *irDzā-*，bur. *irzai-*，kalm. *jarzā-*~*irzā-*，kh. *jardzai-*。

④ mo. *idqa-*《说服》，urd. *iDxa-*，bur. *idxa-*，kalm. —，kh. *jatga-*。
mo. *ilya-*《挑选》，urd. *ilg<a-*，bur. *ilga-*，kalm. *ilye-*~*jilye-*，kh. *jalga-*。
mo. *imayta*《总是》，urd. *imaG't'a*，bur. *imagta*，kalm. —，kh. *jamagt*。
mo. *inay*《爱情》，urd. *inak*，bur. *inag*，kalm. *in!G*，kh. *janag*。
mo. *inčaya-*《马叫》，urd. *intš'agā-*，bur. *insagā-*，kalm. *intsəyā-*，kh. *jantsgā-*。

mo. *injayan*《小羚羊》，urd. *inDzaga*，bur. *inzagaŋ*，kalm. —，kh. *jandzga*。

mo. iljara-《腐烂发臭》, urd. ilDžire-~ëlDžire-, bur. ilzar-, kalm. ildžr-,
kh. jaldzar-.

在绝对词首的元音*i* (a前)的转折图式中,波普所谓的“多数例外”的出处是明确的。由于他把具有喀尔喀方言特征的“*i*的转折”这一语音现象,作为蒙古语史的全部图式而毫无批判地运用,结果把其它方言中仍然完美地保存着的元音*i*统统看成是“例外”,乃至“不规则的变化”。总之,这种“例外”现象是由于过分地扩大“转折”图式的使用范围所造成的。

这里讨论的是在绝对词首这一限定条件下的典型事例,正因为如此,波普他弄错了“转折”图式的使用范围,以致隐藏了由于其它规则性而产生的显而易见的例外,而这种例外几乎恰好构成波普所说的“多数例外”之论点的大部分内容。

有关“*i*的转折”问题曾经有人指出:“由于各个方言的不同,转折所产生的时代和范围也有所不同。”^⑩然而,对具体哪个方言,哪个范围内产生转折等问题所作的明确的结论却是非常少的。所以就现阶段来说,很有必要对各个方言的*i*转折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再进行一次系统的调查。

笔者并不主张“*i*的转折”现象的例外都是由于把“转折”图式错误运用而造成的。这只不过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本文姑且不谈“*i*的转折”图式的合理运用的范围,下文将要探讨的是遗留在捕捉“转折”现象之中应当再度研究的某些问题。

3.正如上所述,从司兰铁的“*i*的转折”图式中很明显地看到*i*>¹a, ¹e, ¹u, ¹ü,等过渡元音,这显然是偏向于“转折”这一术语,过分地强调过渡元音。那么,波普对上述的问题有何看法呢?就象我们在下面所解释的那样,在喀尔喀方言的“转折”图式里,他从¹a, ¹e, ¹u, ¹ü等四个元音中只是采用了¹a这个元音。例如:

《*a前的*i*>¹a, a^②》(喀尔喀方言)

的确,同蒙古旧书面语的第一个音节的(a前)元音*i*相对应,我们从喀尔喀方言中可以观察到元音¹a^②或a这两种类型的单词。例如:

mo. mingyan《千》= kh. mjanga
mo. bira《自然势力》= kh. bjar
mo. nilqa《幼稚的》= kh. njalχ
mo. kirya-《磨擦》= kh. χjarga-
mo. miqan《肉》= kh. maχ
mo. niya-《帖》= kh. nā-
mo. jiyasun《鱼》= kh. dzagas
mo. čirai《脸》= kh. tsarai

那么,在喀尔喀方言的第一音节中出现不同的元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以前这个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可是,笔者却注意到了这一点,甚至采取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元音反映着两种不同形式的发展情况”的观点^⑪。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到第一音节里*i*音痕迹的“不完全转折”现象和在某种程度上根本看不到*i*音痕迹的“完全转折”现象。象这样认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转折,完全是基于蒙古旧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之间各个元音相互对应的这一事实。在喀尔喀方言中不仅仅¹a和a这两种元音同蒙古旧书面语的“a前的*i*”相对应,而且蒙古旧书面语的“u前的*i*”同喀尔喀方言的¹a^①和¹u^②等元音相对应;还有,蒙古旧书面语的“e前的*i*”也同喀尔喀方言的¹i^③和¹e^④等元音相对应。例如;

- ① mo. kidu-《屠杀》=kh. xjad-
 mo. kirγui《小鹰》=kh. xjargui
 mo. niluyun《粘的》kh. njalūŋ
- ② mo. kituya《刀子》=kh. xutga
 mo. kimusun《指甲》=kh. xums
 mo. niruyun《腰》=kh. nurū
- ③ mo. nimgen《薄的》=kh. nimgen
 mo. jigde《整齐的》=kh. džigd
 mo. cime-《打扮》=kh. tšim-
- ④ mo. nigen《一》=kh. neg
 mo. jibe《锈》=kh. dzev
 mo. čike《耳朵》=kh. tsex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喀尔喀方言的“完全转折”和“不完全转折”等语音现象,符拉基米尔佐夫提出所谓“i的转折”的分段学说^②。即:①在喀尔喀方言里非腭化辅音 dz、ts 与蒙古旧书面语的腭化辅音 j, č 相对应;②腭化辅音 dž、tš 与元音 i 前的辅音 j, č 相对应。总而言之,在喀尔喀方言里,尽管腭化辅音 dž、tš 等有时发生腭化变化,但是,这一语音变化在元音 i 前时却受到阻碍。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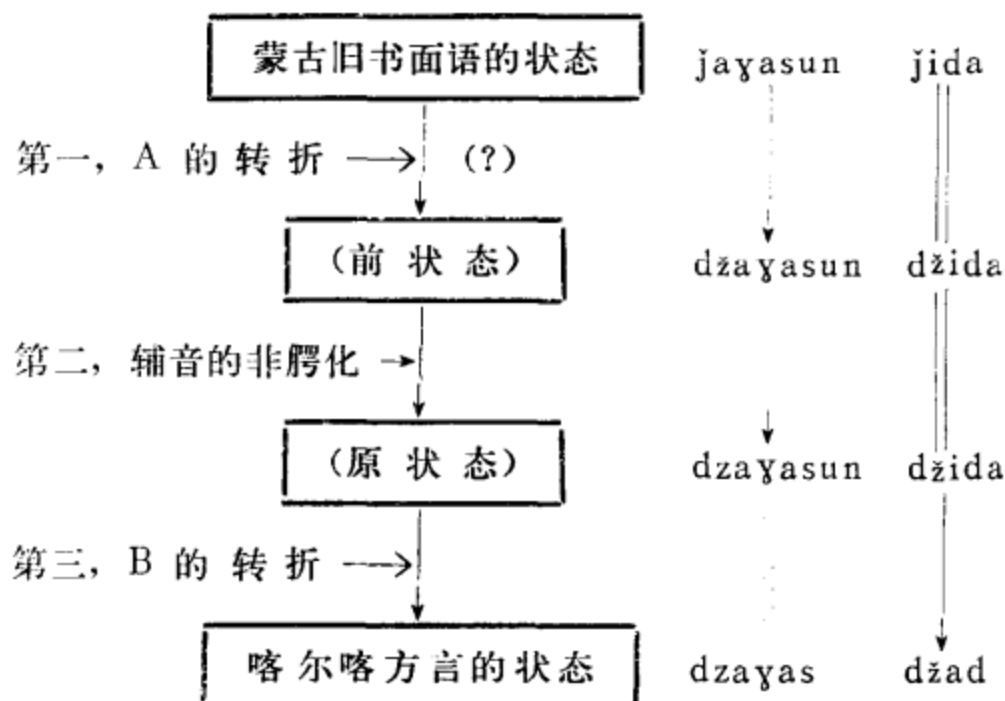
- ① mo. j = kh. dz; mo. č = kh. ts
 mo. jarliy《命令》=kh. dzarlig
 mo. jalayu《青年》kh. dzalū
 mo. jun《夏天》=kh. dzun
 mo. čad-《饱》=kh. tsad-
 mo. čay《时间》=kh. tsag
 mo. čoki-《打》=kh. tsoxi-
- ② mo. j(i) = kh. dž; mo. č(i) = kh. tš
 mo. jida《矛》=kh. dzād
 mo. jirγa-《享受》=kh. dzarga-
 mo. jiruya《大步流星》=kh. džoró
 mo. činar《质量》=kh. tsánar
 mo. čida-《能够》=kh. tšad-
 mo. čingγa《紧的》=kh. tšaŋga

然而,在上述的语音变化中存在着下面的例外。那就是在蒙古旧书面语里具有连接音 ji、či 的若干词,它们与喀尔喀方言的辅音 dz、ts (希望是上面的规则中的 dž、tš) 相对应。例如:

- ② mo. j(i) = kh. dz; mo. č(i) = kh. ts
 mo. jiyasun《鱼》=kh. dzagas
 mo. jiγa-《教》kh. dza-
 mo. jirγuyan《六》=kh. đurgā
 mo. čirai《脸》=kh. tsarai
 mo. čisun《血》=kh. tsus

mo. čiqul《狭窄的》= kh. tsuxal,

对于这种例外的辅音变化,符拉基米尔佐夫解释为:在这些单词里,②'dž>dz,tš>ts等辅音在产生变化之前,元音i已经“转折”为其它的元音③。如果暂时把例②'里产生的元音变化假定为A的转折;同时把②产生的语音变化假定为B的转折,那么,喀尔喀方言的语音是按照下面的顺序变化的:第一为A的转折;第二为辅音 dž>dz、tš>ts的变化(但要保留元音i前的辅音dz、tš);第三为B的转折。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是否把A的转折现象作为一种规则化的语音变化来看待。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下来暂时不进行讨论,那么上面的解释当然被认为是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的。

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所遇到的喀尔喀方言的“完全转折”和“不完全转折”等两种语音现象。A的转折(例: dzagas tsarai)同B的转折(例: džad, tšanar)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前者的词首辅音是非腭化辅音,在那里元音*i*的痕迹没有被承认。相反,后者的词首辅音是腭化辅音,在这里元音*i*的痕迹被承认。因此,A的转折属于“完全转折”,B的转折属于“不完全转折”。

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喀尔喀方言的“完全转折”和“不完全转折”等典型的不同类型的转折现象,反映了不同的时代所产生的不同类型语音变化的结果。“完全转折”是和A的转折属同一种类型。它反映着远古时代的语音变化;而“不完全转折”是和B的转折共属同一种类型,它反映着较新时代的语音变化。

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喀尔喀方言里一直被处理为“i的转折”图式中,包含着难以用一元性转折图式去解释所有语音现象的各种复杂要素。如果无视这一事实,把“i的转折”作为单一的语音现象来掌握的话,那么,就无法清除一连串不能自圆其说的“例外”现象。因此,我们说:自从兰司铁以来被波普所继承下来的传统的喀尔喀方言的“i的转折”图式中,存在着上述重大的问题。

4. 我们根据喀尔喀方言的“完全转折”和“不完全转折”反映着不同时代的两种语音变化的这一推论,就能够提出一个很有趣的事实,那就是:

“喀尔喀方言的转折同鄂尔多斯方言的转折之间有着相关性的关系。”

可以认为鄂尔多斯方言是在第一音节里最能保存元音*i*的方言之一。另外,就象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一样,喀尔喀方言是属于“转折”特征的方言。这种相对的两个方言的差别,看

起来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我们从这两个方言的“转折”关系上也能够看出极其平行的发展情况。

在与蒙古旧书面语的“a前i”相对应的鄂尔多斯方言的若干单词中可以观察到元音a（转折），而且许多单词中还保存着元音i。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在哪些词里产生了“转折”，哪些词里还保存元音i等问题并不十分清楚，这只不过是例举了各自的实例罢了^⑤。但是，我们把收集到的鄂尔多斯方言中的实例同喀尔喀方言的转折现象相比较，就能意识到鄂尔多斯方言里产生“转折”的单词同喀尔喀方言中所隐藏下来的“完全转折”这一范围内的单词完全一致。同样，鄂尔多斯方言中第一音节的元音i的单词同喀尔喀方言属于“不完全转折”的词相吻合，这种相互联系是有规律性的，不存在什么混杂的现象^⑥。

不过，在下例情况里不能被确认也有如上所述的那种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在词的第一音节里与蒙古旧书面语的si（词首是辅音s）相对应的词，在鄂尔多斯方言中则被分为含有元音a（sá）和含有元音i两种^⑦。然而，蒙古旧书面语的si-同样跟喀尔喀方言的ša-相对应。另外，就象已经谈到的那样，在鄂尔多斯方言中，只有jamā《路》（及它的派生词）表现为元音ja，而其它的单词都表现为元音i，并与蒙古旧书面语中的绝对词首元音i（a前）相对应^⑧。但是，在喀尔喀方言里蒙古旧书面语的绝对词首元音i（a前）同样表现为ja音。例如：

① urd. “转折” = kh. “完全转折”

| mo. | urd. | kh. |
|------------|---------|--------|
| miqan《肉》 | maxo | max |
| niya-《帖》 | nā- | nā- |
| jiya-《教》 | Dža- | dzā- |
| jiyar《刺猬》 | Džār | dzār |
| jiyasun《鱼》 | Džagasu | dzagas |
| čirai《脸》 | tšarā | tsarai |

② urd. i = kh. “不完全转折”

| mo. | urd. | kh. |
|------------|---------|---------|
| bira《自然势力》 | Bira | bjar |
| mingyan《干》 | minga | mjaŋga |
| nilqa《幼稚的》 | nilxa | njalx |
| kirya《磨擦》 | k'irga- | xjarga- |
| jida《矛》 | DziDa | džad |
| jiran《六十》 | Džira | džar |
| jirya《享受》 | Džirga- | džarga- |
| čida-《饱》 | tš'iDa- | tšad- |
| činar-《质量》 | tš'inar | tšanar |

与此相关，鄂尔多斯方言的另一个保守性特征就是不存在我们在喀尔喀方言里所看到的腭化辅音转化为非腭化辅音的语音变化现象（dz > dz, tš > ts）。总之，对蒙古旧书面语的辅音j, č来说，经常是与鄂尔多斯方言的dz, tš等腭化辅音相对应。

我们把刚才讨论过的同喀尔喀方言有一定关系的鄂尔多斯方言的特征加以整理的话，就能够得出如下结论。

鄂尔多斯方言:

- (1) 产生了跟喀尔喀方言的“完全转折”相对应的“转折”。
- (2) 不产生跟喀尔喀方言的非腭化辅音 ($d\check{z} > dz$, $t\check{s} > ts$) 相对应的语音变化。
- (3) 不产生跟喀尔喀方言的“不完全转折”相对应的“转折”。

这些结论是和我们在前面为了说明喀尔喀方言发展史所假定的“原状态”相一致的。也就是说, 可以认为处在这种状态下的鄂尔多斯方言忠实地反映了喀尔喀方言较早期的语音发展阶段。因此, 这个事实为我们对喀尔喀方言“不同时代的两类转折”所下的推论提供了有力的傍证。

5. 通过喀尔喀方言和鄂尔多斯方言的比较, 我们明确了“完全转折”和“不完全转折”都是属于不同性质的语音变化。“不完全转折”是属于较新时代里独自产生于喀尔喀方言中的语音变化。与此相反, “完全转折”是属于两个方言的共同现象。我们很难认为这些方言中产生的完全相同的语音变化的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两个方言中共同存在的时代。

特别是, 卡里梅克方言也同“完全转折”相对应, 跟这些方言一样含有转折现象, 这一点很值得考虑。

在卡里梅克方言里除同喀尔喀方言、鄂尔多斯方言的“完全转折”相对应的一个单词^②外, 其它所有的词就象下面谈到的那样, 都含有转折现象。例如:

| | |
|-------------|--------|
| mo. | kalm. |
| miqan 《肉》 | maxen |
| niya- 《帖》 | nā- |
| jiya- 《教》 | zā- |
| jiyar 《刺猬》 | zār |
| jiyasun 《鱼》 | zarəsŋ |

卡里梅克方言的 $sā-$ 音也同喀尔喀方言一样与蒙古旧书面语的 (a 前) si 音相对应。除此之外, 在卡里梅克方言里“转折”是非常有限的, 除了下面所列举的词外, 绝大多数词保存元音 i 。例如:

| | |
|-------------------|--------|
| mo. | kalm. |
| bira 《自然势力》 | barə |
| čimala- 《挽 (袖子) 》 | tšam - |
| čina- 《煮》 | tšan- |
| čingYa 《紧的》 | tšŋgə |
| čida- 《能》 | tšadɔ- |

然而, 卡里梅克方言同喀尔喀方言一样, 腭化辅音发生了非腭化变化。总之, 在某一时期 (1) 发生了 $d\check{z} > z$, $t\check{s} > ts$ 的变化; 可是 (2) 在元音 i 的前面受到了阻碍。例如:

- ① mo. \check{j} = kalm. z ; mo. $\check{č}$ = kalm. ts

| | |
|-------------|--------------|
| mo. | kalm. |
| jarliy 《命令》 | zarl'iG |
| jalayu 《青年》 | zalū |
| čad- 《饱》 | tsadə-~tsat- |
| čay 《钟表》 | tšaG |

- ② mo. $\check{j}(i)$ = kalm. $d\check{z}$; mo. $\check{č}(i)$ = kalm. $t\check{s}$

| | |
|--------------|---|
| mo. | kalm. |
| ǰida 《矛》 | dʒid ^ə |
| ǰirɣa- 《享受》 | dʒirɣe- |
| činar 《质量》 | tšinɣ |
| čingda 《精确的》 | tšind ^ə , tšinɣ ^ə |

因而，我们不得不认为上例中①产生辅音变化时，凡是同“完全转折”相对应的 zā-, zār-, zaɣ^əsɣ 等单词的第一音节中已经有了 i 以外的元音。可是，在同样含有“转折”的 tšamɫ-, tšan-, tšaŋɣe, tšade- 等单词中，还保存着腭化辅音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因此。当辅音产生变化的时候，元音 i 却毫无疑问地被保存了下来。

就是在卡里梅克方言中，也同样存在辅音变化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能够分辨出较古时期的转折和较新时期的转折现象。并且，较古时期的转折是同喀尔喀方言、鄂尔多斯方言的“完全转折”几乎是重合着的。卡里梅克方言的独特性转折被限制在极少数的词内，因此，现在很难决定它是特殊音条件下产生的呢？还是属于借用，或者取决于其它的因素。

笔者认为在喀尔喀、鄂尔多斯、卡里梅克等三个方言中都出现的“完全转折”现象是来源于这些方言并产生于同一个历史年代。从这个意义出发，使“完全转折”在蒙古语史中占有适当的地位，这一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结 束 语

我们对道尔弗提出的“性质特异而难以解释的语言发展”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不错，“i的转折”现象确实非常复杂，令人难以捉摸，但这也决不是不可探讨的问题。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以前之所以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与其说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复杂性，倒不如说这是由于有人把这种语音现象指责成一种奇异的东西而造成的。

这篇文章揭示了“i的转折”在蒙古语的发展史上应占有的地位是怎么样被喀尔喀方言的传统“转折”图式所歪曲了。过去不是对每个方言的转折现象进行实际调查之后才制定出元音 i 转折的对应图式的，而是把同预先制定好的分类原理相一致的语音现象归为“规则性”，而把不一致的归为“例外”。

这里只是探讨了一部分方言在有限条件下产生的“转折”现象（那些正是问题很多的方面）。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首先尽可能系统地去调查和分清每个方言里“i的转折”现象的实际情况。

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只要把“i的转折”看作是一种单一的语音现象，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重蹈前人的覆辙。很明显，“i的转折”现象之所以复杂，这完全是由那些错综复杂的复数特质要素所造成的。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前提，最要紧的是要分清哪些是各方言中共有的“转折”，哪些是各方言所独有的“转折”。

我们应该尽早地放弃把“i的转折”现象算作现代蒙古语的主要语音特征之一的那种单纯的观点。对蒙古语史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要超越单个方言的框框，去追溯远古时期各方言间共有的一部分“转折”现象，而对于较新时期各个方言独自特有的“转折”，我们认为应当把它作为诸方言分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去重新掌握。

注：

① 兰司铁著《蒙古旧书面语和乌尔格方言的比较语音学》。载《芬兰乌戈尔语言协会杂

志》，1903年，第21期，第2页。下面简称《比较语音学》。(G. J. Ramstedt “Das Schriftmongolische und die Urgamundart phonetisch vergliche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XXI; 2, 1903)

② 乌尔格是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市的旧称。

③ 兰司铁著《比较语音学》，第55页图式中的符号 > 的左侧是蒙古旧书面语的转写形式；右侧的斜体字是乌尔格方言的语音标记形式。例中省略了一部分。

④ 叶·契瓦鲁斯的《印度日耳曼语语音学研究导论和基本发音特征》，第5册，莱比锡，1901年，808页。(E. Sievers, Grundzüge der Phonetik zur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Lautlehr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5. Anfl, Leipzig 1901, § 808)

⑤ 波普的《关于蒙古语中元音 i 的所谓转折》，乌拉尔—阿尔泰年鉴，1956年，第28卷，1—2册，第43页。象这样把“转折”只限定在词的第一音节的观点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可是在这篇文章里还是沿用上述的定义比较恰当。

⑥ 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旧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导言和语音学）》。列宁格勒。1929年，第176~190页。下面简称《比较语法》。

再说“喀尔喀”方言是指以乌兰巴托为中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广泛使用的方言，实际上同兰司铁所说的“乌尔格”方言大同小异。

⑦ 兰司铁的图式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图式的最大差别是，符拉基米尔佐夫不承认在蒙古旧书面语第二个音节后的园唇元音 o 和 ö，所以他避开了“o 前的 i”和“ö 前的 i”等图式。

⑧ 波普《蒙古旧书面语语法》，威斯巴登，1954年，第2页。

波普《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赫尔辛基，1955，第15—16页。下文简称为波普《导论》。

⑨ 波普的《导论》。第33—44页。“e 前的 i”除了在布里亚特方言里转变为 e 之外，在其它方言里则有规则地保存着 i 元音。

⑩ 波普的《导论》，第37页。

⑪ 波普的《导论》，第39页。

⑫ 道尔弗著《蒙古属语的分类与发展》，东方学手册，第一部，第五卷，第二段；蒙古语言学，莱顿/科隆 1964年，40页。(G. Doerfer, “Klassifikation und Verbreitung der mongolischen Sprachen,”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Abt, V Band, II Abt; Mongolistik, Leiden/Köln, 1964, S 40.)

⑬ 原稿为《蒙古语诸方言词首 i 音的发展》，发表于《一桥研究》第六卷，第三期，1—16页，1981年。

⑭ 波普的《导论》，第39—40页。

⑮ 兰司铁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由普·阿勒托改著。芬兰乌戈尔语言协会纪念文104, I. 赫尔辛基 1957年，第160页。(G. J. Ramstedt, Einführung in die Alta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I Lautlehre.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p. Aalto,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04; 1, Helsinki, 1957, S 160)

⑯ 波斯楚是根据布里亚特方言和卡里梅克方言各自的特点建立图式。

波斯楚的《布里亚特语的正字法与转写》，1955年《中亚学报》第一期，第94页。(U. Posch “Zur Orthographie und Transkription des Burjatischen”, Central Asiatic

波斯楚的《卡里梅克语及其亲属方言》，东方学手册，第一部分，第五卷，第二段落：蒙古语学，来顿/科隆，1964年，第202页。(U. Posch “Das Kalmückisch und verwandte Dialekte”,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Abt, V Band, II Abschnitt: Mongolistik, Leiden/Köln, 1964, S. 202)

①7 波普的《导论》，第40页。

mo = 蒙古旧书面语，

urd = 鄂尔多斯方言，

kalm = 卡里梅克方言，

bur = 布里亚特方言，

kh = 喀尔喀方言。

①8 这里引用的例词基本上来源于如下资料：

mo: 莱辛的《蒙英辞典》第二版，布鲁明，印地安那州 1960年。(F. D. Lessing et al.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Bloomington, Indiana, 1960)

urd: 田清波的《鄂尔多斯语辞典》纽约/伦敦 1968年再版。(A. Mostaert, Dictionnaire Ordos, New York/London, 1968 <rpt>)

bur: 切尔米索夫的《布里亚特—俄语辞典》莫斯科 1973年。(К. М. Черемисов «Бурят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1973)

kalm: 兰司铁的《卡里梅克语词典》，赫尔辛基 1976年再版。(G. J. Ramstedt, Kalmückisches Wörterbuch, Helsinki, 1976 <rpt.>)

Kh: A. 鲁布桑敦德布著《蒙俄辞典》，莫斯科 1957年。(А. Лувсандэндэв «Монголь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1957)

①9 服部四郎的《蒙古语及其它的方言》。东京，大阪，1943年，第227页。

波普的《论蒙古语的所谓破裂 i》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二十八卷，1—2，1956年，第47—48页。(N. Poppe “On the so-called breaking of i in Mongolian”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Bd. 28: 1—2, 1956, S. 47—48)

卡卢楚恩斯基的《蒙古语中 i 消失的问题》，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三十六卷：34，1965年，第340页。(S. Kałużyński “Zur Frage der i-Brechung im Mongolischen”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Bd. 36; 34, 1965. S. 340)

②0 波普的《导论》第39页。

②1 在现代正字法里由 Я (= ja) 表示。

②2 原稿是“参考《i的转折》—蒙古语 i 音发展的规则性和不规则性”。发表于日本蒙古语学会《蒙古研究》：1981年，第12号。32—49页。

②3 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前引书，第399—400页，405—406页。

②4 但是，与此相反，符拉基米尔佐夫为什么非要提出：“只是比②’中的例词早产生‘转折’”这样一个疑问呢？有关这个问题他本人没有解释。

②5 田清波著《蒙古语鄂尔多斯方言》第二十一卷，第863页，1926年，(A. Mostaert “Le dialect des Mongols Urdus (Sud)” Anthropos XXI, P 863, 1926)

②6 拙稿是“《i的转折》再论—喀尔喀方言和鄂尔多斯方言的平行发展—”，日本蒙古语学会《蒙古研究》第13号，1983年，37—55页。

②7 在同蒙古旧书面语相对应的鄂尔多斯方言里出现 ša-，这是在 mo. siCa- 这一语音

连用上有 C = b, γ, q, r, rγ, rq, 等现象。其它情况下 (C = bq, d, j, lγ, lj, lt, m, n, nd, ngl, nt, rb, t) 在鄂尔多斯方言里都表现为 ši 音。

⑳ 这种情况下鄂尔多斯方言的 jamā 有可能反映更古时代的“i 的转折”。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方言的借用”，对于这种现象很难决定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㉑ mo.cirai《脸》，Kalm. tširē。

引用文献

栗林 均著“参考《i 的转折》—蒙古语元音 i 发展的规则性和不规则性。”发表于日本蒙古学会《蒙古研究》，第 12 号，1981 年，第 32—49 页。

栗林 均著《蒙古语诸方言的词首元音 i 的发展》发表于《一桥研究》第 6 卷第 3 号，1981 年版，第 1—16 页。

栗林 均著《〈i 的转折〉再论—喀尔喀方言和鄂尔多斯方言的平行发展》发表于日本蒙古学会《蒙古研究》第 13 号，1982 年，第 37—55 页。

服部四郎著《蒙古及它的方言》，东京，大阪，1943 年。

道尔弗著《蒙古属语的分类与发展》，东方学手册，第一部，第 5 卷，第二段：蒙古语言学，来顿/科隆，1964 年，35—50 页。(Doerfer, G. “Klassifikation und Verbreitung der mongolischen Sprachen”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Abt., V Band, II. Abschnitt; Mongolistik, Leideo/Köln, 1964, S. 35—50)

卡卢楚恩斯基著《蒙古语中 i 消失的问题》。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 36 卷；3—4，1965 年，第 340—347 页。(Kaluzyński, S “Zur Frage der i-Brechung im Mongolischen,” Ural-Altäische Jahrbücher, Bd. 36; 3—4, 1965, S. 340—347)

莱辛著《蒙英辞典》修订本，布鲁明，印地安那州，1973 年。(Lessing, F.D. et al.,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corrected rpt., Bloomington, Indiana, 1973.)
莫斯泰尔特著《蒙古语鄂尔多斯方言》，第 21 卷。第 851—869 页，1926 年。第 22 卷，第 160—186 页。1927。(Mostaert, A. “Le dialect des Mongols Urdus (sud)” Anthropos XXI, 1926, pp. 851—869; Anthropos XXII, 1927, pp. 160—186)

莫斯泰尔特著《鄂尔多斯语辞典》纽约/伦敦，1968 年再版。[Mostaert, A. “Dictionnaire Ordos, New York/London, 1968(rpt.)]

波普著《蒙古旧书面语语法》，威斯巴登，1954 年。(Pope, N.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Wiesbaden, 1954)

波普著《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芬兰乌戈尔语言协会纪念文 110 号，赫尔辛基，1955 年。(Pope, N.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10, Helsinki, 1955)

波普著《论蒙古语的所谓破裂 i》，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 28 卷；1—2，1956 年，第 43—48 页。(Pope, N. “On the so-called breaking of i in Mongolian” Ural-Altäische Jahrbücher, Bd. 28; 1—2, 1956, pp. 43—48)

波斯楚著《布里亚特语的正字法与转写》，1955 年，《中亚学报》第一期，第 81—100 页。(Posch, U. “Zur Orthographie und Transkription des Burjatische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I, 1955, pp. 81—100)

波斯楚著《卡里梅克语及其亲属方言》东方学手册，第一部分，第5卷，第二段：蒙古语学，莱顿/科隆，1964年，第200—226页。(Posch, U. "Das Kalmückische und verwandte Dialekte,"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 Abt, V Band II Abschnitt; Mongolistik, Leiden/Köln, 1964, S 200—226)

兰司铁著《蒙古旧书面语和乌尔格方言的比较语音学》。芬兰乌戈尔语言协会杂志，1903年，第21期，第2页。(Ramstedt, G. J. "Das Schriftmongolische und die Urgamundart phonetisch vergliche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XXI: 2, 1903)

兰司铁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由普·阿勒托改著。芬兰乌戈尔语言协会纪念文，第104号；1，赫尔辛基 1957年。(Ramstedt, G. J. "Einführung in die Alta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I Lautlehre.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P. Aalto,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04: I, Helsinki, 1957)

兰司铁著《卡里梅克语辞典》赫尔辛基 1976年再版 (Ramstedt, G. J. Kalmückisches Wörterbuch, Helsinki, 1976 <rpt>)

契瓦鲁斯著《印度日耳曼语语音学研究导论和基本发音特征》，第5册，莱比锡，1901年版。(Sievers, E. Grundzüge der Phonetik zur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Lautlehr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5. Anfl., Leipzig, 1901.)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旧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导言和语音学)部分。列宁格勒，1929年。(Владимирцов, Б. 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и халхаского наречия, Введение и фонетика» Ленинград. 1929)

鲁布桑敦德布著《蒙俄辞典》，莫斯科，1957年。(Лувсандэндэв, А. «Монголь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1957.)

切尔米索夫著《布里亚特—俄语辞典》莫斯科，1973年版。(Черемисов, К. М. «Бурят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1973)

译自《言语研究》第82卷，1983年。

(上接第64页)

动词以及物意义的结合动词被其他的具有被动意义的结合动词所代替，例如：be æmæl aværdæn“生产、执行”—be æmæl amædæn“产、进行”，a]na kærdæn“使相识”—a]na]odæn“认识”、“熟悉”。而且表示被动意义的结合动词可以被同义词所代替。不过被动态的形式可以由某些及物的复合动词构成，例如：ente]ar dadæn“公布”和ente]ar dade]odæn“公布出来”。有一些复合动词的被动意义可以既用词汇的也用语法的手段表示。在被动的结构里动作的主体(动作的人)在叙述上借助于前置词〔应为前置词组合—译者注〕æz tæræf(字面上是‘从…方面’)，be bæsele, be basete“利用”和其他一些表示出来，例如：name æz tæræf-e mæn neve]te mi]ævæd“信被我写”。

译自《现代波斯语》莫斯科 1960年